

浦江清先生的名作《八仙考》，精彩之处是有关八人之原型与演变研究，特别是这一群体或个人在通俗文艺中的定位与变化。因成文较早，细节出入确有一些，比方吕洞宾传说的最早产生，他认为始于北宋庆历间的岳阳地区，就稍晚了一些。

1983年，我撰《〈全唐诗〉误收诗考》（刊《文史》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4月）时，即揭出《皇朝事实类苑》卷四三引《杨文公谈苑》记载：“吕洞宾者，多游人间，颇有见之者。丁谓通判饶州，洞宾往见之，语谓曰：‘君状貌颇似李德裕，他日富贵皆似之。’谓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谓今已执政。张洎家居，忽外有一隐士通谒，乃洞宾姓名。洎倒履见之，洞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素纸笔，八分书七言四韵词一章，留与洎，颇言将佐鼎席之意。其末句云：‘功成当落破瓜年。’俗以瓜字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讖也。洞宾诗什，人间多传写，有自咏云：‘朝辞百越暮三吴，袖有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又有‘饮海龟儿人不识，烧山符子鬼难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铛内煮山川’之句，大率词意多奇怪类此。世所传者百余篇，人多诵之。”《杨文公谈苑》是黄鉴记录杨亿谈话的专著，原书不传，今有李裕民辑本。《说郭》卷二一有宋庠序，知所載为杨亿晚年，即大中祥符末至天禧初所谈，记录不晚于真宗末年。上述二事，一为拜见丁谓于丁任饶州通判时，在他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第后不久，还是太宗时期，吕以李德裕预言他的前途。丁在真宗初告知杨亿，杨谈话时丁方

濠上漫与

# 吕洞宾的最早记录

■陈尚君



《宋本太平寰宇记》

为相，杨死后二年丁方贬窜南方，为杨不及见，而吕告丁似李德裕，其实包括为相与贬死两层含意，其神奇如此。张洎（934—997），《宋史》卷二六七有传，从南唐归宋，卒于太宗末，吕之造谒，更在其前。当时还引到《宋史·陈抟传》载：“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世以为神仙，皆数来转斋中，人咸异之。”《宋史》成书虽晚，但所据多为宋国史，陈抟卒于端拱元年（988），为时更早。那时我推测“吕岩仙事疑为真宗时道士托名”，似过分小心了一些。

1997年，拙著《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收入前文时，有较大增订，有关吕洞宾增加了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田太尉候神仙夜降》的记载，说田重进移镇永兴（即长安），到泾州，遇道士张花

项，张告“昨日街市，偶见仙人”，即吕洞宾，重进信之，半夜候吕降，终未遇，且云“时人皆知吕洞宾为神仙”。张、田，《宋史》皆有传，田镇永兴为淳化三年（993），卒于四年后，张则在咸平四年（1001）以右仆射判永兴时“备知其事”。即在太宗中期，吕为神仙，在今关中已是众所周知的传闻。上世纪90年代，研究八仙渐成风气，我也指导过一篇以八仙为题的博士论文。此节记载是否我首次举出，已不记得，但因此而能将浦先生的说法推前超过半个世纪，仍觉愉快。

可否再往前推？似很困难。从五代到宋初，有三部重要的神仙传记，一是杜光庭《仙传拾遗》，约成书于前蜀；二是沈汾《续仙传》，成书于南唐；三是《太平广记》，卷首有七十多卷仙传，成书于宋太宗初年，其中收书最晚为徐铉《稽神录》。

三书皆无吕洞宾记载，可认为其传说尚未进入主流学者的视野。

那么吕洞宾自述家世是否可靠？前引杨亿所云“洞宾自言吕渭之后。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洞宾系出海州”，为吕自言家世的最早记录。与后世称他为吕让之子不同，杨亿所云为“系出海州”，即是吕让的后人，并非让子。吕渭墓志已在洛阳出土，为其长子吕温撰，拓本见《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编》611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12册158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060、《全唐文补遗》四辑81页。吕家晋时迁居河东，吕渭曾祖项官济州录事参军，祖崇嗣为秘书郎，地位都不高。渭父延之，肃宗时任浙东观察使，渭至德宗时官至湖南观察使，方为显宦。其子温、恭、俭、让，皆有文名，温有文集存世，与柳宗元交厚，尤享时誉。让墓志也早已出土，拓片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三十二册，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7。让（792—854），为渭晚年所生子，7岁时父母皆亡，得诸兄提携成人，23岁登进士第，33岁后曾任海州刺史，在任时去豪右，抚孤鰥，收葬枯骨，招复流庸，较多善政，墓志多所赞许。此后他曾任德王傅，贬太子洗马分司东都，复为濮王傅，改秘书监致仕。就是说，他最出色的政绩在海州，但海州并非他终官。吕洞宾自述称他为海州，并自称为他后裔，颇可玩味。海

州即今江苏连云港，从汉晋以来，即多神仙传说。吕洞宾若宋太宗中期还在世，距吕让去世，至少已经一百三四十一年，当然不可能。但如为吕让后裔，或者说吕让留在海州一脉之后人，比如曾孙，甚或顶冒或传说之后人，均属可能。如果出生在唐末至五代初，宋太宗时七八十岁，身体健康还能四处奔走，再加一些夸张和虚构，应属可能。南宋后传他咸通间因科举落第而隐遁求仙，就很不可信了。

我一直以为，吕洞宾传说为宋人编造，宋以前全无痕迹可寻，近日因一则记载而稍有改变。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九《吉州》载：“雪浪阁，在县北崇元观。吕洞宾有诗云：‘褰裳懒步寻真宿，清景一宵吟不足。月在碧潭风在松，何必洞天三十六。’”此则亦见《舆地纪胜》卷三一转引，但似乎没有引起编录唐诗与研究吕氏仙事学者特别的关注，作《全唐诗补逸》的孙望先生，据《太平寰宇记》补录了郑敞题梧州白鹤观诗，却没有看到此诗。《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以宋初三道记述全国政区建置，地名变化截至太平兴国后期（下限为983年），所收文学作品最晚者，为该书卷一一《江州》录南唐相里宗题远大师塔诗：“古墓石棱楼，寒云晚景凝。空悲虎溪月，不见雁门僧。”该书作者乐史（930—1007）是抚州宜黄人，初仕南唐，他录吕题吉州诗，很可能在南唐时已有所知。这里他不是录传闻，录仙事，而是在叙述地方官观时，录一首相关作品。换言之，这里的吕洞宾不是传说，是一位往日留下作品之作者。因此，此诗可以看作曾是诗人而非神仙的吕洞宾最早留下的记录。

# 爱泼斯坦的战地采访笔记

■郑学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珍藏着战地记者爱泼斯坦的采访笔记。这是1938年4月3日至10日，他在台儿庄战场的采访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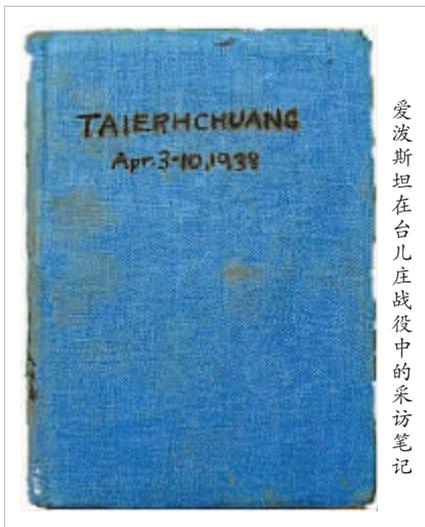
爱泼斯坦（1915—2005），生于波兰华沙，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先后在哈尔滨、天津等地求学；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七七事变”后，22岁的他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奔波于硝烟弥漫的抗日最前线。1938年3月下旬，他与电影摄影师伊文思及其助手约翰·卡帕和美国驻华使馆海军助理卡尔逊组成记者组，在一位中国年轻军官陪同下，自汉口前往徐州，专程观察台儿庄战事。他们前往第五战区司令部拜访李宗仁时，恰遇三位农民赶着一群黑猪在司令部大院，随行军官介绍，这是前来慰劳军队的老百姓。爱泼斯坦记载：“李宗仁将军身材矮小，方肩、圆脸，两眼闪闪有光，出身于农民家庭，正值中年。头上短而稠密的发丝略带灰白。但他精力充沛如钢质弹簧，是一个闪烁着有攻击能力的人。谈吐和蔼，简短而刚毅。”

4月2日晚，爱泼斯坦等人在徐州乘火车前往台儿庄。次日早晨，总司令孙连仲招待早餐。“在一个向阳的庭院里，一位农家妇女赶着一头蒙了眼的驴用石磨磨着麦面。孙将军身材魁梧，结实，声音嘶

哑，两眼布满了血丝，带有倦意。孙将军简短地告诉我们关于台儿庄的重要情况，正引诱日军进入为他们准备的陷阱。”

4月7日晨，爱泼斯坦后来记录道：“台儿庄城里余烬未灭，整个街道已彻底摧毁成一片断墙残垣，死尸、没有炸的炮弹及手榴弹到处皆是。在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者在美丽如画的小溪旁植下的柳荫道，现在差不多全被尸体和炮火击断的柳树填满了。”他看到，衣着破烂、形容憔悴的战士正在运送战利品。弹痕累累和被烧得黑焦的城墙上，可见一些宣传画和标语：“把敌人赶出去！”“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爱泼斯坦等人采访了参战官兵。他们废寝忘食，白天采访，晚上整理资料。一天下午，爱泼斯坦一行沿日军撤退路线出城采访。北城墙外有四辆坦克。在邵庄，看到20辆重型卡车和一些履带牵引车以及300匹死马。数百具赤裸的日军尸体躺在村庄附近的坟地，中尉以上的军官身体前放着一小排木牌，共有四五十堆。到处是未爆炸的炮弹和铜弹壳。在驻扎城东的27师，他见到缴获的日军文件中记录着日军官员写的一首诗：“战斗四个小时我们占天津。六个小时以内我们进驻济南城。小小的村庄台儿庄，



爱泼斯坦在台儿庄战役中的采访笔记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占领？！”一本日本士兵的日记写道：“我们为什么而战？中国人民面对着恶魔的折磨。我们自己也长期遭受苦难和牺牲。只有天国知道哪里是我们的葬身之地，又有谁来收葬我们！”

傍晚时分，在他们返回台儿庄途中，爱泼斯坦在跨越弹坑时被绊倒。他定睛一看，弹坑里竟藏着一个日本伤兵，拿着枪正瞄准着爱泼斯坦。他大喊“有鬼子！”并

迅速卧下。随同的士兵眼疾手快，抬手一枪击毙了鬼子。

4月8日，爱泼斯坦看到逃难的人们开始返回家园。他们从废墟中挖出自己的东西，在受到严重破坏的房子里清扫出一块睡觉的地方。邮政局也在半倒塌的房子里恢复营业。一列火车驶进了面目全非的台儿庄北站。

4月11日，爱泼斯坦回到徐州。他写道：“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开创了军队的新纪元。虽然这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受制于劣势的装备，也缺乏统一组织和训练，而仍能在这个古战场以战略取胜，打败日军。这个事实的意义是深远的。”爱泼斯坦在台儿庄采访笔记中记录了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和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记载了包括对李宗仁、孙连仲、池峰城、金典戎、田镇南等多位高级将领的采访。

1939年，爱泼斯坦以其采访笔记为主要素材，创作出版了纪实报告《人民之战》，其中《反击》一章详细介绍了台儿庄战役发生的背景、经过、胜利成果和重大意义。他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赞颂浴血奋战的中国英雄；他以笔为枪，无情抨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揭露日军在台儿庄犯下的滔天罪行。宋庆龄评价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斯诺称赞这本书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